

人口经济学的现状

(日) 大渊宽

人口经济学是由人口效果分析和经济效果分析这两方面组成的。但迄今为止，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诚然，古典经济学派也曾自发地提出过正确方向，尤其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体系中，包含有原始人口经济学的内容，但其模式是朴素而一元化的，而且再无发展。经长期停滞以后，由于三十年代的人口减少经济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成长论的出现，终于开始向多元化模式的结构发展，其成果首先出现在法国。最近，以美国为中心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研究内容，范围甚广。这里特其若干题目，特以其分析方法和理论结构为中心，表述其发展的过程和现状。

(一) 出生力的经济理论

自古典学派消沉以后大约一个世纪，经济学一直没有提出说明人口成长的理论。在此期间，人口转换理论虽经社会学者和人口学者的努力而获得发展，但这一理论并未被有理论造诣的现代经济学者所共同承认。五十年代在经济成长理论中复活了的人口成长理论，属于和古典学派的马尔萨斯理论与人口转换理论完全不同的范畴。由于死亡率稳定在低水平上，人们更加关心出生力，并且将其经济的决定因素作为研究的中心。用于这种分析的是微观经济理论。

当把出生力的决定因素置于经济理论的结构中进行分析时，其基本前提是，人类的再生产活动是每对夫妇的小形人口活动，它与消费和就业一样，是决定家庭经济意志的一种重要形态。如果从对孩子的需要和抚养这样的观点考虑再生产活动，并以合理的决定家庭经济意志作为前提，那么，价值理论就能适用，选择消费者的理论也会被采用。

最早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并取得成果的是利贝斯蒂。他的模式实质是这样一种假定；即，当夫妇决定所希望的出生人数时，将使有限子女数带来的效用和非效用保持平衡。这种合理计算只适用于多子女人家。效用包括消费效用(直接效用)，劳动或所得效用(间接效用)和保障效用。非效用则包括直接费用(养育费和教育费)和机会选择费用(为养育多子女而放弃的双亲所得)。随着平均人口所得的增加，其有限效用降低，而有限非效用则增加。因此，多子女的家庭数减少。在利贝斯蒂的模式中，就是这样说明在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生力何以会不断下降。

一九六〇年，贝克尔(G. S. Becker)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把选择消费者理论用于出生力分析上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假定，由夫妇的意志决定是否生孩子这一不变嗜好，是导致家庭利益扩大化的合理行动，根据这一嗜好，视生孩子和采购耐用消费品一样，并付诸行动。

贝克尔认为孩子基本上不是低级财产。因此，随着所得水平的提高，人们将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这说明所得水平和出生力成正比例。然而现实情况说明，所得水平和出生力都成反

比例，理论和实际不一致。对于这个难题，贝克尔及其追随者认为，这是因为小孩的价值不是一个固定质，价值效果比所得效果更重要些。根据他的观点，对小孩的费用增加，将提高小孩的质量。所得高的家庭希望高质量的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就要更多。因此，尽管所得高，但要求孩子的质量也高，从而所得高的家庭的子女数反而自然减少。

仅仅根据小孩的质量，是否就能说明价值效果和所得效果相互抵销？在贝克尔一派的研究者中也提出这个疑问，而且对此说法不一。从六十年代到今天，在出生力的经济理论中的主要争论之一，就是围绕带来这种价值效果的因素而展开的。下面就此作若干介绍。

在近似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弗里德曼(D. Freedman)的相对所得假说。利贝斯蒂最近提出的模式也属于这一理论系统。这一假说认为，决定小孩人数的不是家庭的绝对所得水平，而是丈夫的在其所属职业集团中与其他成员相比较的相对所得。抚养小孩的费用，依其所属社会经济集团的平均所得而异。所以，高于集团平均所得的夫妇尽管与属于平均所得高的集团的另外夫妇的所得相同，也会多生孩子。但是，在一个同样集团内部，高于平均所得的家庭比平均所得的家庭要多生孩子。这一模式虽然完全符合现实情况，但就价值效果的说明还不充分。

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与微观经济理论看法稍微不同的新的出生力经济理论。这是一种把家庭中的时间分配理论运用到出生力分析上去的理论，是新的家政学的探讨。贝克尔就此也起到了革新的作用。他把一般的时间分配理论公式化了。价值效果理论在这里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与传统的经济理论不同，这一新的经济学认为家庭中也存在生产活动。家庭的生产活动是同商品和时间相互适当结合的，所以，生孩孩子和养孩子也是家庭产品的重要部分。生孩孩子和养孩子，对母亲来说是一种时间约束最大的劳动。母亲的时间价值，在生孩孩子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时间的价值是人的资本储备的增加函数，所得高的家庭，教育水平也高。所以，生养小孩的机会选择费用，在所得高的家庭中也越高，小孩的价值较比其它财产也就越大。

这种理论可以称作机会选择费用的价值效果论。所以，问题不在于小孩的质量，而在于母亲的质量(教育与收入能力)。这一点，不同于贝克尔的最初模式。即使不提价值效果理论的作用，仅家政学的这一发展，也对出生力的经济理论贡献很大。由于它把家庭生产、人的资本和时间分配的理论巧妙地加以处理，从而不仅对出生力，连同结婚、生育间隔、抚养、教育和保健等这些从来不为经济学所涉及的活动，都能够在选择理论的结构中进行分析。这一点，称得起是在经济理论中开辟了新的领域。

贝克尔派的两个学派，即微观经济理论学派和新家政学理论学派，在这十几年中，相互交替地各取得一定发展。而与这些学派完全不同的出生力理论却在美国发展起来，那就是伊斯特林(R. A. Easterlin)学派。它与贝克尔学派相互轻视，关系敌对。

双方的争论始于一九六六年。这一年，伊斯特林向贝克尔一九六〇年的论文提出挑战，否定了对方所依据的嗜好不变的假定。那一假定是经济学中的传统准则。根据嗜好的变化和差异而行动不同的论述，虽对社会学者是一常识，但对经济学者来说，却是个禁区。伊斯特林竟冒犯了这一戒律，他虽然承认所得水平与出生力成正比例，但他认为抵销所得效果的不是价值效果，而是嗜好的变化。这里，重要的是愿望这一观念，是决定其愿望的家庭间的相对所得或相对地位这一概念。他的基本假说是，年轻人的现实所得能力与愿望(是为之努力

的生活标准，依赖于婚前的消费标准）之间的均衡是影响出生力的因素。

出生力依家庭间的相对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异的观点，今天已被称之为“伊斯特林假说”而获得很多人的赞同。曾与上述观点水火不相容的贝克尔学派的人，近一两年来也采用了这种假说的一部分，放弃了初期的纯经济理论性的研究。截至一九七六年底，两派之间还有鸿沟，但由于贝克尔学派的单方让步，分歧现已消除。经济理论与社会学的结合，诞生了新的出生力理论。

（二）人口效果理论

人口与经济间存在多种联系方式。在论述人口变动在经济上的作用，即论述人口效果时，人口计量经济理论无不包括劳动力供求的方式，而没有把其它经济变数结合在人口因素之内。这是由于在劳动力以外，对人口变动很少有别的有影响的的经济因素，从而很难把两者的关系计量化。迄今为止，人口效果的研究，仍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发展。

由于凯恩斯学派的减少人口经济学对人口效果作了多元化分析，而改变了古典经济学派的一元化分析，从而最先发展了人口效果理论。凯恩斯、汉森、雷德韦(W. B. Reddaway)和斯彭格勒(J. J. Spengler)等人把人口增加与消费需要，投资机会、储备倾向以及资本系数等关系，和年龄结构与消费形式的关系都进行了理论性和实证性的分析。近年来，经济成长理论阶段、成长理论和库斯尼茨(S. Kuznets)的实证主义式的经济成长论，在这方面作出了莫大贡献。但是，这些成果没有按照经济人口学体系加以汇综。从现有观点看，还留下许多未解决的课题。我们的汇综也未必充分，不妨把问题集中为四点：1. 资本形成；2. 劳动力；3. 资源；4. 技术，并就其研究现况作以下简单归纳。

首先观察一下人口变动对资本形成的影响。最初引起人们重视的是索维(A. Sauvy)的人口投资概念。它指出当人口增加时，要使整个生活水平保持在以前水平，需要必要的投资。但人口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例高时，则不能说人口增加对经济发展有利。

急剧的人口增长，一般要扩大消费需要，并通过它刺激投资需要。资本储备较少的不发达国家，由于急剧的人口增长和伴随而来的年轻化的年龄结构，提高了消费倾向，所以资本供给受到妨碍，产生资本的超量需要。而且，当资本供给少时，急剧的人口增长将提高人口投资比例，阻止生活水平的上升。这已是一般的见解。

相反，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人口增加是否具有提高资本供给的作用？对此，见解有分歧。多数意见认为，人口增加率低，从属负担则小，而储备率则高。因为劳动力人口通过生产活动，从中进行储备，劳动力人口占整个人口比例越大，被供养者(老人和小孩)的比例就越小，这样，对储备就越有利。但是，库斯尼茨反这种观点，他主张在发达国家迅速增加人口能够扩大储备。克拉克(C. Clark)也支持这种观点，但尚没有取得充分的实际证明。

其次，人口和劳动力的关系是特殊的。由于劳动力是人口的一部分，而且二者长时期按同一方向变动，所以，在古典经济学派的模式中，往往不把二者明确加以区分。而符合现实情况的分析是，由于劳动力本身可以视为一种变数，所以在观察人口效果时，可把劳动力当作媒介变数，并通过它分析对其经济变数所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增加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积极效果是十分重要的。不消说，这是经济学一贯作为经济收益理论的重要问题而加以着重分析的，今天，在生产函数的理论中更得到了很好的处理。

再其次，人口和资源的问题，包括土地、粮食、自然资源等一些不同的侧面。传统的经济学把劳动、资本和土地当作三大生产要素。但最近经常使用的生产函数，只包括劳动和资本，而把土地除外。这意味着包括土地的一般资源不被当作生产的制约条件。不言而喻，从长远观点看，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尤其在现代急剧的人口增加和经济成长，使人们强烈地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因而助长了议论资源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般思潮。资源问题的一个侧面，是资源分部的不合理。

此外，人口增加与粮食资源的对抗关系，对于人类也是最基本的问题，所以自古以来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特别在十八世纪末，马尔萨斯把人口原理公式化以后，更加成为热烈讨论的对象。当然，也是现在人口研究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最后，有关人口和技术关系的研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六十年代曾提出过两个有趣的假说。第一是西普拉(C. Cipolla)的假说。它指出约在一万年前，农耕文化(农业革命)的形成和传播，起因于人口增加的压力。克拉克也曾表明过同样想法。第二是发展了西普拉假说，并把人口压力的作用更加明确模式化了的博斯拉普(E. Boserup)的假说。她把耕地的播种次数这一概念加进去，把人口增长可提高土地利用系统的集约程度模式化，推论出原始社会中的农业技术的发展，只有在一定的人口密度中才有可能。这一假说，作为农业社会中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对考虑人口压力，提供了有力根据。

(三) 适度人口理论

人口效果通过各种途径表现出来，综合其各种利弊，根据单一指标对其纯效果加以表现的一种尝试，就是适度人口理论。适度人口观点早已存在，但在概念上进一步明确化，还是比较近代的事情。二十世纪初，由威克泽(K. Wiksell 1851—1926)和坎南在理论上加以公式化的。坎南根据收益法则，把在其它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使平均人口产量达到最大值时的人口定为适度人口。这常称为坎南适度人口，并成为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起源。

坎南的理论把人口过剩或过少的意义作了明确规定，这点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但对他的理论，很多学者提出了许多问题。如：其适度概念过于静态；难以实际测定；在平均人口产量以外仍有可取的适度标准，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适度人口理论的关注曾一度降低。而近年来，对其研究重又活跃起来。除测定问题外，均取得了若干发展。首先关于适度的标准，确无必要局限于坎南的平均人口产量，而且也可以设定经济以外的目的。在赋予理论以一定形式时，重要的是客观地、具体和计量地把握其目的。因此，所能采用的标准自然受到限制。目前加以理论化的仅限于总福利、平均人口福利、国力和军力等。它的公式化是于一九五〇年由米德(J. E. Meade)、斯彭格勒和索维完成的。

近年来，这种理论在动态研究上取得了发展，适度人口成长率已被标准化。根据吉尔蒙(P. Guillaumont)的理论，在分析适度人口时，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化过程中可分为五个阶段，即：

(1) 纯粹静态：是在把其他条件(资本、技术、年龄结构等)作一定假设的前提下研究人口效果。这就是适度人口。

(2) 比较静态：是有关当其他条件中的某一条件发生变化时，对人口效果的变化程度的研究。人口效果在两种不同的状态下进行比较。

(3)有限动态：是对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的人口变动对经济成长的效果所作的分析。其它条件，特别是人口以外的生产因素被视为外在的，按一定比率变化。在这种结构中，通常不能认为是适度人口成长率。

(4)扩张动态：在前者的基础上，考虑人口变动对其他条件特别是对其他生产因素的效果，依此决定经济适度人口成长率。

(5)一般动态：人口变动已不再是外在变数，而成为内在变数。把经济发展诱发的各种变化所造成的反作用全部加以考虑，同时分析人口变动的经济效果。

根据这种划分，很明显，坎南的理论只停留在最初的纯粹静态阶段。这种理论所依据的静态的、假设的假定，由于不符合现实而受到批判。适度人口理论竟依据这种假定而成立，真是莫大讽刺。对技术的固定不变假定，与利用现有技术的不发达国家有关，也许还能成立。但是，资本量的固定不变假定，则完全缺乏现实性，至少必须考虑到资本量与人口是同时、按比例增加的。

这种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动态适度人口成长的概念。事实上，最近的理论研究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而且已进入扩张动态领域，但尚未达到一般动态。奥林(G. ohlin)、科克伦(S. H. Cochrane)、索维、吉尔蒙等人的理论模式值得重视。

这些模式的基本假定，是把资本形成当作人口成长的函数。例如，根据奥林的模式，人口成长在一定限度内刺激投资，但如超过限度，则使储备能力下降，投资减少。另一方面，如果土地固定不变，把由可变的人口和资本构成的生产函数同投资函数结合起来，就能扩大适度人口成长和平均人口所得成长。当进一步把这种模式用于制定政策时，不论是促进或抑制人口的成长，都必须进行必要的试验。在科克伦的模式中很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适度人口或适度人口成长理论的公式化，还有其他多种形式。这里不着重介绍其内容，只是根据分析方法和适当标准，将其主要的相同类合并成下列一览表。

表 适度人口理论的类型

分析方法	总产量或总福利	平均人口产量	平均人口福利	国力、军力	固定成长
静态					
大	米德 (1954)	坎南 (1914)		索维(1956)	
小	恩格 (1966)		斯彭格勒(1914)		
动态					
大		库 (1955) 奥林 (1967) 科克伦(1973) 吉尔蒙(1976) 索维 (1976)			哈罗德(1948) 罗宾逊(1956)

(曹南译自南亮三郎、上田正夫编：《人口学的方法》，日本千仓书房，1978年版)